

简论约翰·伯格小说 G 中的流亡现象

蒋 茜,徐梁峰

(浙江科技学院 语言文学学院,杭州 310023)

摘要:流亡作为永不枯竭的文学主题,引领无数学者竞相对其阐释。约翰·伯格的流亡人生为他的创作注入了动力。针对伯格的第四部小说 G 中的流亡主题,分三个不同时期对主人公的流亡经历进行了分析:童年时期的流亡、成年时期对家园的寻求及最后的回归。小说所表现的流亡主题对当今社会流亡现象的思考具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流亡;回归;G;约翰·伯格

中图分类号: I106.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10)01-0051-04

Brief analysis of exile in John Berger's G

JIANG Qian, XU Liang-feng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As an oft-occurring motif in literature, exile arouses a large amount of scholarly attention. John Berger's own exile experience motivates his literature creation.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exile exemplified in G. The protagonist G's exile is analyzed in three different periods: the exile since his childhood, the pursuit of home in adulthood, and the final return. The exile presented by the novel provides enlightenment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xile in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exile; return; G; John Berger

约翰·伯格,当代英国艺术批评家、小说家、剧作家、画家。20世纪50年代开始迅速成为英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有多部艺术专著问世,如《观看之道》《毕加索的成败》《另一种讲述的方式》等,都被誉为艺术评论中不可不读的经典之作。伯格创作了多部小说,但国内外对约翰·伯格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艺术评论领域,对其小说的研究却鲜有涉猎。伯格的小说洋溢着感性与诗意,触动读者内心深处,让人深思。苏珊·桑塔格曾说:我尊崇并热爱约翰·伯格的作品。他为世间真正重要之事写作,而非随兴所至。在当代英语作家中,我奉他为翘楚;自劳伦斯以来,再无人像伯格这般关注感觉世界,并赋之以良心的紧迫性。论诗意,他或许稍逊劳伦斯;但他更机敏、更关注公共价值,风度气节亦胜一筹^[1]。他的小说 G 在 1972 年发表,并获得了当年的布克奖。但因其极具实验性的风格引起一些争议,甚至非议。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仍然以探讨写作风格居多,几乎没有触及小说中表现的流亡这一主题。笔者认为,G 中所隐含和折射的现代社会中的流亡现象意义重大,不可不察,值得深入探究。

收稿日期: 2009-05-11

作者简介: 蒋 茜(1979—),女,山东济宁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1 流亡的定义

流亡是人类古老的经验,是一种与个体或群体现存处境相分离的生活形式、话语形式和精神定向。萨伊德在《流亡的沉思》中这样界定流亡:它是强加于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真实家园之间无法愈合的伤口;它那极大的哀伤永远也无法克服^[2]。流亡有两种形态:外在的流亡和内在的流亡。外在流亡即“与存在之地域相分离”,指由于不同的原因,个人长时间或永久远离故土,移居异国他乡;而内在流亡是指“与精神之地域相分离”^[3],是指个人内心的一种被放逐、被驱赶或被流放的状态。对于外在流亡,客居他乡是最重要的形式。而内在流亡是一种精神的流亡,现实的家园并非真正的家园,精神的流亡者在自己的本国故土也会有流亡感,其真正的家园是流亡者心之所向。精神流亡是对在各种文化及力量冲击影响下急剧变化的世界的一种反应。不管是哪一种流亡,这种与自我的处境相分离的状态,都意味着疏离、缺失和被剥夺感。对流亡者而言,回归只是一种心理情愫,不能实现。正如神话,令人向往却又遥不可及。最终的结果如萨伊德所说,流亡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来,无法回到某个更早、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更可悲的是,永远无法完全抵达,永远无法与新家或者新情景合而为一^[4]。

2 约翰·伯格的流亡

伯格声称,移居(emigration)和驱逐(displacement)^[5]的经历在他所有文学创作中都有所刻画。在探讨伯格作品流亡主题时是不能忽略作者本人的流亡经验的。

1926 年约翰·伯格出生在英格兰南部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但是伯格从 12 岁开始就认为他不属于如此“沉闷(stifling)”^[5]的地方,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局外人。年轻的伯格在服完兵役之后进入切尔西艺术学院和伦敦中央艺术学院学习。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伯格以画家身份开始其个人生涯,在此期间,他开始为伦敦著名杂志《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撰稿。他的左翼人道主义倾向,大胆而犀利的论断,使其迅速成为英国颇具争议性的艺术批评家。之后伯格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他的前三部小说,从不同的侧面刻画了英国社会流亡者的生活,小说中充斥着英国都市生活的疏离和忧郁,这也是伯格自己内心在英国社会精神流亡状态的一个写照。1962 年,对英国社会的厌倦使得伯格最终决定离开英国,在法国阿尔皮斯山区的一个小山村隐居。后来在他接受采访时说,他的离开并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只是内心感觉在欧洲大陆要比在英国更有归属感^[6]。伯格本人的流亡给了他在这方面深邃的洞察力。在他的前三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要么抗拒对家园的寻找,要么在寻找家园中屡遭挫败。在第四部小说 G 中,伯格将流亡这一主题深化,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绝对流亡者的生活。

3 G 中的流亡

伯格的 G 描述的是一个“唐璜”式人物的生活。主人公 G 是一个意大利商人和其美国情妇的私生子,从小被寄养在母亲的表兄妹乔斯林(Jocelyn)和比阿特丽斯(Beatrice)的农场里。15 岁时,他受到比阿特丽斯的引诱,失去了处子之身。从此他开始了追逐女性,纵情声乐的日子。他没有政治信仰,对自己的性伴侣没有阶级、种族的歧视。故事的最后,G 卷入了战争暴动,被误当作奸细投入大海。G 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童年开始的流亡,成年时期对家园的寻求及最终的回归。

3.1 童年开始的流亡

G 首先是一个现实层面的流亡者。他从出生就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家的地方。G 的父亲是意大利人,已有妻室。母亲是美国人,离异单身。他们在各地旅行幽会,最终 G 的母亲为了自己的独立权,离开了 G 的父亲。G 在巴黎祖母的家里出生,出生不久就被送到母亲表兄妹的英国农场里寄养。因此,G 的特殊出身就决定了他流亡的命运的开始。

幼年的 G,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他总在寻找和他不同,能作为他的另外一半或对立面和他对照的一个人^[8]。五岁的他对自己的家庭教师海伦小姐产生了朦胧的爱,这种爱恋为他提供了可作对照的“他者”。对于“他者”的思考可以说是 G 最初的回归尝试。

为什么我会被禁锢在自己的皮肤之内?……是什么在我体内,我是如此的熟知,而别人却无从知晓?我如何让别人知道?我到底存在于什么之中——这个我无法离开,生存其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但是海伦小姐很快被另一个家庭教师替代,G懵懂的回归尝试被扼杀,陷入了更深的流亡。作为G的监护人的乔斯林和比阿特丽斯之间不伦的兄妹恋也使得G感觉自己是“第三人”,一个局外者。孤独的G常常陷入对客观世界和自我的思考中。

他看着下面房子亮着灯的窗户,……每扇窗户都代表一个房间。窗户就如同他拉开的房间的抽屉。里面温暖、安全、有他熟悉的生活。但是他却不属于其中,……他待在山毛榉的阴影中,……就如同站在一个小小的棚屋里,这个棚屋如他身体般大小,他从开口的一边向外张望。

在这样的年纪,他就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存在和世界分开。虽然他住在农场里,但是农场并不是他的家。他住在自己的身体里,他从自己的身体里向外观察这个世界。他知道未知是永恒的,他唯一的出路就是使自己变得坚强,要战胜一切恐惧。作为一个流亡者,处在孤独中,他给自己建筑了坚固的堡垒,但是这个堡垒并不是可归宿的家。

3.2 成年时期对家园的寻求

15岁的时候,G受到刚丧夫的比阿特丽斯的引诱,失去了处子之身。他第一次的性经历为他打开了通往神秘的回归之地的大门。

让我们去那个地方。……它将他包裹其中。是如此的轻松。之前是无法想象的,就如同已生之物的再次新生。

G的这种心态可以被看作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恋母情结,人类从离开母胎就开始了流亡,是离开“母亲子宫的流亡者”。这也就是萨伊德所说的“孤儿”心态,因这种心态反应出来的痛苦不堪或怀旧可以称之为美学上的恋母情结。比阿特丽斯的身体向G打开了回归母体的大门,女性身体呈现的不同为G提供了参照自我的“镜子”,G处在“自我”和“他者”的对立状态中,在对立中增加了自我意识。G开始踏上返回迷失家园的回归之路。他开始追逐女性,从与她们的欢爱中寻找自我和家园。

他对自己的性伴侣没有阶级和种族的歧视:从乡下旅馆的女招待、贫穷的斯拉夫女工到富有的汽车制造商、银行家的妻子。他不相信任何“伟大的事业”,他不是梦想家。在女性的世界他拥有绝对的权威,他的主动强势控制着与她们交往的始终。G和一个个女性演绎着艳事,每一段艳事都是G的一次回归,但是G天生是个过客、一个陌生人,他的人生之路注定在下一个城市、下一段艳事中。这种过客的状态注定了他持续的漂泊和寻觅。

3.3 最终的回归

“在流亡之前及之后都曾经或者将会有个家园”^[7]。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伦敦的气氛让G感觉越来越窒息,他迫不及待想要离开。于是在一个外交部工作的朋友的安排下回到了G父亲的故乡意大利的里雅斯特。虽然他对政治毫无兴趣,但是却被卷入了政治阴谋中。在那里,G继续追逐着女性,但是他面临的现实并不是他想要的。当被引诱者的丈夫对其引诱行为公开表示支持的时候,G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彷徨和愤怒。虽然G在女性的世界里如鱼得水,但是在男性的世界中,他的权威受到威胁,岌岌可危。G的报复行为也只换来从舞会的狼狈逃窜。此时,G对生活陷入了彻底的迷茫当中。他的脑海里不断出现过去的画面,这些画面和眼前的一切重叠在一起,无法理清。他的记忆如同“装满镜子的大厅”“所有的映像都闪动”^[8],但是这些画面并没有把过去拉得更近,反而使得过去像“一个世纪前”^[8]的事情。他面前的道路不是通向将来的未知;相反,不管他怎么选择,都好像是对过去的重复。时间对他已经是毫无意义。最后他选择把自己的护照送给斯拉夫女工。他切断了自己继续旅行的后路,通过留下来他才可以“前进”。而此时的“前进”即是将自己的命运交予外在世界。他漫无目的地跟随着暴动的人群游行,他在人群的簇拥下前行“就如同装在棺材里的一具尸身”^[8]。这里小说已经在铺垫G的最终归宿。当他被挟持谋杀时,G没有反抗,G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死亡。当太阳落下,小说也落下帷幕,“地平线就是帷幕的下边沿,突然间落下,结束了演出”^[8]。

正如萨伊德所说,流亡者的最终的归宿是“虚构”的,真正的回归是不可能的,流亡者所取得的一切

成就永远都无法弥补流亡所带来的遗失。流亡者要结束这永无止境的旅行,到达彼岸,死亡是唯一的出路。

4 结语

流亡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是它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落;相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们为了求生存,巨大的移民潮使得流亡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存状态。然而必须看到,尽管回归是神话,其出发、迂回、回归的过程却不会因此变得虚无而毫无意义。伯格的 G 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流亡者的心路历程,其中对流亡生活的刻画对人们思考流亡、面对流亡,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 [1] 约翰·伯格. 毕加索的成败[M]. 连德诚,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2] SAID Edward W.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173.
- [3] 刘小枫. 流亡话语和意识形态[M]. 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153.
- [4] 爱德华·萨伊德. 知识分子论[M]. 单德兴,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2:48.
- [5] SEAN O'Hagan. A radical return[EB/N]. [2005-04-03]. http://observer.guardian.co.uk/review/story/0,6903,1450864,00.html#article_continue.
- [6] DYER Geoff. Ways of Telling: the Work of John Berger[M]. London: Pluto Press Limited,1986:161.
- [7] PAPASTERGIADIS Nikos. Modernity as Exile—the Stranger in John Berger's Writing[M].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3:8,143.
- [8] BERGER John. G[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1972:40-316.

(上接第 40 页)

3.2.3 政府应纠正自身“错位”,努力完善区域市场机制

区域内各地方政府为了在竞争中获益,过度利用行政力量干预市场,如比拼税收优惠政策、土地价格等,完全忽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对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为此,政府必须转变职能,摆正位置,成为站在社会公众利益上对市场行为进行监管的“守夜人”^[1]。共同协商制定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规划,统一市场准入政策和规则,努力完善各类市场机制,规避相互间的恶性竞争和浪费,实现区域各方互利共赢。

4 结语

综合上述,市场与政府作为区域一体化的两大主角,在推进和实现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发挥过主角或配角的作用,由于市场与政府自身的缺陷,仅仅发挥其中任一主角的作用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实现市场与政府“有主有次”的主配角色互补,实现两大主角的功能最大化,是推动和实现区域一体化的有效策略。

参考文献:

- [1] 陆阳,史文学. 长三角批判[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80,198.
- [2] 张海冰. 欧洲一体化制度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 [3] 苏竣,杜敏. AVS 技术标准制定过程中的政府与市场“双失灵”——基于政策过程与工具分析框架的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06(6):39-45.
- [4] 王臻荣,常轶军. 政府失灵的又一种救治途径——一种不同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2008(1):55-58.
- [5] 洪银兴. 长江三角洲区域共同市场建设[J]. 上海经济研究,2004(6):41-47.
- [6] 郭正林. 论政府与市场结合的四种模式[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2):8-13.
- [7] 刘祖云.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双重博弈与伙伴相依[J]. 江海学刊,2006(2):106-111.